

浅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

· 赵重阳

内容提要 战略伙伴关系是冷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中国和巴西具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意愿及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潜力。1993 年中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重大进展,在经济、科技和国际事务等领域的合作尤其令人瞩目,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合作的先例。由于两国的具体利益和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期许存在差异,双方的合作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然而,只要两国的整体优先目标保持一致,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就会继续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进入 21 世纪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并于 2012 年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关键词 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 巴西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与巴西作为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于 1993 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先河。本文全面回顾和梳理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动因、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 90 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为新世纪以来中巴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充实了“伙伴关系”外交的内涵。

一 战略伙伴关系:冷战后兴起的新型国家间关系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各国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在这一背景下,大国关系出现战略性调整,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之间开始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探寻新型大国关系的相处模式。于是,“伙伴关系”外交应运而生,其中以“战略伙伴关系”尤为引人注目,如中俄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美俄间的“成熟战略伙伴关系”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与这些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彰显相互间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随着“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中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在积极推行和使用这一

概念时却未对其给予明确的官方定义。不仅如此,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未能就这一概念提供明晰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战略伙伴关系”时,因研究情境和研究主题的不同而对这一概念持不同的理解和解读。有学者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是“涉及两个强大的、能够共同采取战略行动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①有学者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是由“对绝对收益、相对收益、威胁以及改变力量平衡的预期推进的”,应有被明确确认和长远规划的共同利益和期望,其目标应是多维的、在多个领域实施且属于全球范畴的。^②有学者认为,伙伴国间“由共同利益产生的相互依存使他们的关系和合作更具活力”,并借此达到他们的目的。^③还有学者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由于伙伴国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对一些国际事务具有共识,但又不寻求结成完全的联盟,因而采用这一概念描述双方关系。^④有中国学者认为,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推行的“伙伴关系”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以合作为目的,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及不针对第三方的国家

① Michael Emerson, *The Elephant and the Bear: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 and their Near Abroads*, Brussels,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01, p. 45.

② Jonathan Holslag, “The Elusive Axis: Assessing the EU-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9, No. 2, 2011, p. 295.

③ Haris Raqeeb Azeemi, “55 Years of Pakistan-China Relationship”, in *Pakista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Pakistan Horizon*, Vol. 60, No. 2, April 2007, pp. 122 - 123.

④ Sumit Ganguly and Andrew Scobell,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ging a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2, No. 2, Summer 2005, p. 40.

收稿日期: 2014 - 10 - 20

作者简介: 赵重阳,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间关系；伙伴国之间通常设有协调或保障机制。^①

可以看出，虽然国际关系研究中对于“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并未形成一致定论，但对“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建立并发展的因素仍有一些共同看法。其一，战略伙伴国之间应是相对平等的，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对国际、地区乃至各自的国内事务具有一定的共识。这是双方能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战略伙伴国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但应具有解决分歧的机制。其二，战略伙伴国之间应具有共同的目标、利益和相互依存度，这是推动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使其保持活力的动力。一旦这些共同利益和目标消失或出现断裂性因素，这种关系就可能终止。其三，战略伙伴国间的合作应是双赢的、经过长远规划的、多领域多维度的合作，这样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关系完全具备以上要素，具有建立和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天然优势。冷战结束后，中巴两国为应对新的国际环境和挑战，及时抓住机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二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

中国和巴西于1974年建交。在建交后的近20年间，虽然两国政府十分重视双边关系，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的关系发展主要集中于贸易往来，而在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则十分有限。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和巴西彼此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两国最终于1993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巴两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在于中巴两国具有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意愿和潜力。

（一）中巴两国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是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没有历史积怨，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反而拥有很多相似性和共同的利益。其次，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大国，双方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科技成果各有所长，有很大的互补性。最后，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巴西都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的重任，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且两国对许多全球性问题的看法十分相似，在外交政策上有着许多一致之处和吻合点。^② 这些优越条件为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巴两国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

中巴两国领导人一直十分重视发展双边关系。1982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时任外交部部长时就指出，“中国和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又都是大国，两国应该把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得更好。特别是在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下，中巴两国更应该加强来往，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③ 1984年，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访华时则表示，发展巴中两国间的合作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和科技诸方面的合作。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进一步增强了中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意愿。首先，中国加强了与拉美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巴西一直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中国因此将巴西视为“忠实的朋友”。^④ 其次，中国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需要寻找高品质的原材料和新的市场及资本来源。巴西是拉美经济较发达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强与巴西的合作有助于中国获取所需的原材料和出口市场。最后，巴西是拉美最大的国家，又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员，对拉美地区事务特别是南美洲地区事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加强与巴西的合作有助于中国增进与拉美国家特别是南美洲国家的关系。

对巴西而言，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间，巴西饱受外债危机、经济衰退和高通货膨胀率的困扰，经济增长缓慢且波动较大。为了尽快恢复并发展经济，巴西希望利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促进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其次，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巴西希望能与中国突破单纯的经贸关系，加强在高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再次，欧共体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巴西的对外贸易面临新的挑战，而亚洲地区总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给巴西外贸发展带来新的机会。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增强与中国的合作有助于巴西开拓亚洲市场。最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渐增大，

① 王巧荣：《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载《思想理论导刊》，2006年第2期，第56~57页。

② 《佛朗哥总统举行盛大午宴欢迎江主席》，载《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4日第1版。

③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57~258页。

④ Oswaldo Biato Junior, *A Parceria Estratégica Sino-Brasileira: Origens, Evolução e Perspectivas (1993 - 2006)*, Brasília, 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 2010, p. 65.

巴西希望通过建立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来“巩固巴西在国际范围的议题”。^①

（三）中巴两国将进一步加深合作的潜力

中巴两国都是发展中大国，虽然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平缓，但到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前，两国在一些领域的合作还是富有成效的，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合作也开始起步。

经贸合作一直是中巴关系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和巴西都拥有规模较大的经济和广阔的市场，双方发展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1993年之前，两国已达成政府间合作协议30多个，为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保障和条件。^② 两国的贸易发展较快，1985年中巴贸易额已从建交之初的1742万美元^③增加到14.1亿美元^④，约占当年中拉贸易额的55%。两国间的投资合作也开始起步，到1989年年底，中国已在巴西建立了7家贸易公司和合资企业，巴西也在中国建立了4家银行和贸易公司办事处。^⑤

政治合作是中巴两国十分重视的合作领域。虽然中巴两国建交后政治交往较少，但并不缺乏重要的高层往来。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两任总统访华，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则于1990年访问巴西。两国对各自关注的问题也相互给予理解或支持。如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巴西没有跟随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孤立，而是表示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对于巴西关注的环境保护等问题，中国也给予支持，如李鹏总理出席了1992年6月在巴西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此外，由于中巴两国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相近，两国在多边领域等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科技合作一直是中巴两国积极推进的合作领域。虽然1993年之前中巴科技合作非常有限，但也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如1982年和1984年先后签署的科技合作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补充协议，以及涉及核能、水电、地质和空间技术等领域的一系列合作协定。此外，两国还开始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开创了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空间领域合作的先例。

可以看出，中巴两国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前就已经在一些重要领域开展合作。当然，这些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两国的经济规模以及各自在区域和全球性的地位与影响力并不相称。但同时，这一状况意味着中巴两国关系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前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将有利于促进中巴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向纵深化方向发展，进而推

动两国关系的全面快速发展。

三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成就

正因为中国和巴西具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所需的基础、意愿和潜力，因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在政治、经济、科技及国际关系等合作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一）政治关系更加密切

两国对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给予了肯定和发展。1993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巴西时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两国领导人多次对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予以肯定。1994年8月，巴西时任外长阿莫林表示，巴中关系是坚实牢固的，巴西决意同中国保持一种长期的、以两国合法利益为基础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年11月，佛朗哥总统在会见到访的乔石委员长时表示，巴中政治对话更加成熟，战略伙伴关系的含义更加明确；两国政治对话已达到高水平，今后应加强特定项目的合作，使双边关系更加充实。1995年12月，卡多佐总统在访华期间表示，巴中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方面，而且涉及科技、经贸等各个领域，合作前景是很好的，从而进一步提出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1996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巴西时表示，中方赞赏卡多佐总统提出的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愿与巴方共同努力，将两国间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

两国政治领域的合作更加频繁和广泛。除两国国家领导人互访之外，两国政府各部门间的交流也日趋增多。仅1994年中国就有25个副部长级以上的团组访问了巴西，1996年增加到80个。两国在立法、政党和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也得到加强。在立法交流方面，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政

① Oswaldo Biato Junior, *A Parceria Estratégica Sino-Brasileira: Origens, Evolução e Perspectivas* (1993 - 2006), Brasília, 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 2010, p. 66.

② 《江主席佛朗哥总统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4日第6版。

③ 天放：《中巴经贸合作前景广阔》，载《中国企业报》2000年8月18日第6版。

④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596页。

⑤ 《杨主席在巴西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90年5月21日第1版。

协主席李瑞环分别于1994年和1995年访问巴西；巴西议会领导人、议会和议员代表团以及议会委员会代表团也多次访华。在政党交流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都出访巴西，胡锦涛于1994年4月率中共代表团访巴，受到巴西总统佛朗哥的接见；巴西民主运动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党等主要党派的领导人和代表团也多次访华。

两国在一些国际事务和各自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巴西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与发展议程、南北关系、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持相同立场。此外，巴西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①、申办2000年奥运会、加入美洲开发银行以及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等问题上给予支持；中国则支持巴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支持巴西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的立场，并对巴西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表示理解。^②

（二）经济合作快速发展

1993~1999年间，中巴两国继续签署多项经济合作协议，如关于发展铁矿石贸易和促进合作开采铁矿的意向协议、为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对两国政府经济合作协议的补充协定和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补充协议等。此外，两国还于1999年12月结束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并于2000年1月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的双边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巴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

在贸易领域，中巴双边贸易额自1985年达到14.1亿美元后一度下降。1993年巴西实行了市场开放政策，中国大幅增加了大豆、铁矿石等商品的进口，中巴贸易额出现回升并于1994年恢复到1985年的水平。此后几年，中巴双边贸易迅速增长，1997年达到25.33亿美元；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中巴贸易额下降为18.44亿美元，但次年又回升至28.45亿美元。^③

在投资领域，至1995年年底，中国在巴西开办的企业和机构增加到40多家；巴西在华投资的项目协议98个，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④到1999年年底，中国在巴西投资兴办的企业已达50家，其中中方投资5030万美元；^⑤巴西在华投资项目193个，直接投资额4924万美元。^⑥中国在巴西的投资项目主要包括贸易、木材加工、矿石开采、机电产品组装、冶炼、渔业、服装、餐饮等；巴西在华的投资项

目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建设、筑路工程、餐饮项目等。中国多家著名企业在巴西投资设厂或成立合资公司。

在劳务领域，到2001年6月底时，中国在巴西共签订劳务承包合作合同38份，合同金额5754万美元，完成营业额2776万美元；^⑦巴西企业则参与了中国云南省天生桥一号水电站、黄河支流上的石壁崖电站以及新疆公路建设等项目。

（三）科技合作成效显著

科技合作一直是中巴两国政府积极推进的合作领域。为进一步加强双方的科技合作，中巴双方于1994年4月签署1982年科技合作协定的三个补充协议^⑧，于1995年签署了关于科技合作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人才交流的补充协议等文件。到2000年，中巴两国签署的科技合作协定、协议和议定书等文件多达十余个。双方开展科技合作的领域已经非常广泛，包括航天航空、信息技术、通信、水电、农牧业、林业、医学医药、环保、地质、交通能源、化工、生物技术、水产养殖和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中巴两国联合研制地球资源卫星项目尤为引人注目。两国自1988年正式展开中巴地球资源卫星的研制工作后，曾由于多种原因而一度陷于停滞。1993年，中巴签署两国政府《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补充协议书》，决定对研制工作给予经费和条件上的支持和保障，使得研制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经过两国科研人员十余年的不懈努力，首颗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最终于1999年10月发射成功。这是一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遥感卫星，可为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矿产、能源、土地、海洋、环保、测绘、城乡规划、灾害监测等国民经济的众多领域服务，为中巴两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重

① 《江主席与卡多佐总统会谈》，载《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4日第1版；《江主席佛朗哥总统举行会谈》，载《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4日第6版。

② 《钱其琛在巴西利亚举行记者招待会》，载《人民日报》1993年11月26日第6版。

③ 这里涉及的中巴贸易数据请参见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④ 陈立品：《中国与巴西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载《国际商报》1995年12月12日第1版。

⑤ 天放：《中巴经贸合作前景广阔》，载《中国企业报》2000年8月18日第6版。

⑥ 吕银春、周俊南编著：《列国志：巴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45页。

⑦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美大司一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巴西项目建设》，载《国际商报》2001年11月11日第42版。

⑧ 这3个补充协议分别是新材料领域的补充协议、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领域的补充协议和中医中药领域的补充协议。

要贡献。此次合作不仅涉及该领域尖端技术的相互转让,而且涉及中期卫星发射服务的开发,被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四) 促进中拉关系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拉美主要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时期都得到发展。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巴西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发展较早,双方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巴西也成为拉美第一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二是发展较平稳,双方关系没有因政府更迭等原因而出现大的起伏或倒退;三是发展较全面,双方关系并非只侧重于某一领域,而是在多领域多层次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对推动中拉关系起到积极作用。首先是对拉美其他主要国家具有示范效应。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墨西哥也于1997年与中国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①进入21世纪后,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秘鲁等国也陆续与中国建立和发展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增强中国与这些国家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关系。

其次是促进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的关系。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对于拉美地区事务特别是南美洲地区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中巴关系的快速发展有助于加强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特别是南美次地区组织的关系。如1996年巴西担任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巴西外长,正式提议建立中国同南方共同市场的对话或磋商机制,得到对方的积极支持和响应。1997年10月,中国与南共市建立对话关系,到2000年年底已举行三次对话,其中有两次是在巴西担任轮值主席国或代理轮值主席国期间举行的。

最后是促进中拉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中巴经贸合作的发展对中拉整体经贸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很大。巴西长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90~2000年,中巴贸易额占中拉贸易比重年平均率为26%,是中拉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与中国在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拉美国家中独树一帜,吸引更多拉美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如继中巴开展卫星合作之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也与中国在卫星领域进行了合作。

四 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 20世纪90年代存在的问题

中国与巴西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差异和分歧,因此,除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外,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

虽然中巴两国对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总体上是相互理解和支持的,但双方之间仍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分歧。比如,对于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针对反华提案的“不采取行动”动议,巴西在1990~1995年间都投了弃权票,这对中国击败西方的反华图谋也是一种支持。但在1996年,巴西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主席国时对中国“不采取行动”动议投了反对票。这一举动令中国政府十分震惊和难以理解。此后,中国邀请巴西人权国务秘书来华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加深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沟通 and 理解,才使巴方改变态度,并在之后的几年里一直投弃权票。^②此外,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入常”一直是巴西对外政策的重心之一,巴西希望中国能明确支持其“入常”。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改革、支持巴西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巴西“入常”问题上态度一直含糊不明,致使巴西国内因此出现质疑两国关系的声浪。

20世纪90年代,中巴经济合作在取得很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中巴贸易额的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中巴贸易总量在中拉贸易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这表明中巴两国在90年代的贸易合作未能充分发展,与两国的经济发展潜力不相吻合。二是中巴贸易摩擦增多。随着中巴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大量进入巴西市场,对巴西企业造成较大冲击。为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巴西多次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成为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之一,对双边贸易关系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三是巴西对一些合作成果感到失望。巴西一直寄望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能给巴西企业带来更多参与中国大型建设项目的机会。但是,中国在三峡大坝等大型项目中主要使用

① 2003年,中国与墨西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与墨西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② Oswaldo Biato Junior, *A Parceria Estratégica Sino-Brasileira: Origens, Evolução e Perspectivas (1993 - 2006)*, Brasília, 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 2010, p. 99.

本国的资金和技术,使得巴西的这一期许未能实现。此外,巴西还希望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能促进巴西高附加值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但直到 90 年代末,巴西对中国的出口仍然以初级产品为主。这些都使巴西感到失望,以至于认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直到 90 年代末“仅仅是一种修辞”,双方“甚至对其内容都没达成真正的一致”。^①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巴战略伙伴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一些问题,但并未影响双方关系良性发展的大趋势。两国并未由此形成对立,而是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一些问题因此得到较好的解决,如人权等问题。2004 年,美国最后一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反华提案,巴西首次对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投了赞成票。关于巴西“入常”和两国在经贸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因涉及两国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模式等因素,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还需双方在以后的合作中继续沟通和调整,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式。

由于两国的具体利益和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期许

存在差异,双方的合作也存在一些分歧,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巴两国之间出现的分歧和问题体现了“战略伙伴关系”的风险性,即战略伙伴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是基于伙伴国对共同利益的认同而建立的;一旦伙伴国间的国家利益出现偏差,或各自的优先利益发生变化,战略伙伴关系就会受挫。

尽管中巴两国在具体合作领域的优先目标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两国整体的优先目标是一致的,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增强对直接影响两国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重大决策的影响力和参与程度。只要两国整体优先目标保持一致,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就会继续向前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才能在进入 21 世纪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并于 2012 年被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责任编辑 黄念)

^① Oswaldo Biato Junior, *A Parceria Estratégica Sino-Brasileira: Origens, Evolução e Perspectivas (1993 - 2006)*, Brasília, 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 2010, p. 102.

(上接第 59 页)

扩张,中智自贸协定具有净贸易创造效应。不同的是,面板数据引力模型估计的贸易效应为 333%^①,远远低于横截面数据 1219% 的计算结果。卡雷尔(2006)在使用横截面数据引力模型和面板引力模型估计后计算相关区域贸易协定贸易效应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他认为应该采纳面板数据模型计算结果。对此的可能解释为,横截面数据引力模型估计设定中采用了多边阻力项的代理变量 GDP 加权平均距离。代理变量的使用并不是最优的估计方法,进而使用该估计结果计算的贸易效应的可信度必然受到削弱。

四 主要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中智自贸协定极大地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并促进了双方对外贸易的增长,从而增进了中智双方及世界的福利水平。

中智双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是促使自贸协定产生较大贸易创造效应的基础。中智自贸协定实施以来,关税的削减促使双方的优势产品更好地进入对方市场,满足了市场需求并提升了生产效率。

中智自贸协定对中智双方区外贸易并没有贸易转移效应,却有贸易创造效应。这主要源自中国的大国经济规模及智利的小国经济和较高的对外开放

度。一方面,中国的大国经济规模和快速增长刺激大宗产品需求上升,从而带动世界价格上涨,产生了贸易条件效应,促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国更愿意向中国出口,这成为贸易创造效应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智利经济规模较小且专业化生产少数产品,这促使其必须通过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来满足其国内多样的消费需求,加之智利具有较高的开放度,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智自贸协定可能带来的贸易转移。

综合以上,中智自贸协定带动了世界福利的整体提升。为此,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智利的经贸合作,挖掘双方合作的潜力,充分发挥自贸协定的积极效应。同时,基于中智自贸协定效应的产生机理是双边经济规模的互补性和对方的高度开放,中国可寻找类似国家(特别是一些资源丰富且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双边自贸谈判,以此来确保友好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资源供应。此外,智利的情况在拉美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应利用中智自贸协定的示范作用,扩大在拉美的自贸区建设范围,促进中拉经贸合作稳步扩大。

(责任编辑 高涵)

^① 计算公式为 $\frac{1}{n} [\exp(1.141) - 1] \times 100 + \frac{1}{n} [\exp(0.443) - 1] \times 100 + \frac{1}{n} [\exp(0.497) - 1] \times 100$ 。